

民國基督教會史(一) (1911—1917)

查 時 傑

一、前 言

本文所要敘述的這段歷史，在時間上指的是從民國成立以後，到大陸變色之前止的那段歷史（1911~1949）；在內容上，則準備要描繪出這段前後的有四十年之久，而由歐美等地傳播入華的基督教會的歷史，詳細地敘述教會在中國的發展與受挫的種種，也將描繪教會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中，如何接受挑戰，並回應種種挑戰的過程。至於本文斷限於民國卅八年（1949），係因以後的教會史，呈現多元而繁雜的局面，除了原有大陸的教會外，還有臺灣地區與海外華僑地區的教會之出現，都自成系統，以收集史料不易，並且牽涉的範圍過於廣闊，故不得不暫時斷限於此，將有待他日以另篇論文來描繪它了。

至於題目中的「基督教會」一詞，指的是狹義說法，就是專指在基督教（Christianity）的三大系統中——天主教（Catholic）、東正教（Orthodox）與新教、或稱更正教（Protestant）的最後的那一支，前兩支（天主教、東正教）在華的歷史，則以能力所限，亦不在本文敘述的範圍之內，如此說來，本文旨在描繪從民國成立到大陸易色之前的這段約有卅八年之久的時期內，有關更正教在中國地區的諸面相，期望能為中西交通史與中國基督教史，譜出一篇新的樂章來。

二、民國成立以後基督教會史的分期問題

雖然本文所要敘述的歷史，在時間上尚不足半個世紀，但其中的變化曲折之處多矣，所以必須以分期的方式來處理，才能解說清楚；何況歷史的最大特性乃是「變」（Change），歷史的分期目的就是在找出其中的「變點」（Turning Point）來，觀察出歷史的「質變」與「量變」，可從而了解各時代的特性（註1），故基於這些因素，本文準備先由基督教會的分期問題說起，先分析已有各家的分期，再提出經歸納後所得出較合理的分期來，然後就各段分期段落，依時間的秩序，逐段說

註1：張玉法著：現代中國史的分期問題，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一輯總論，頁3，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台北，民國六十九年）

明各期的歷史真相來。

1. 各家的分期：

截止目前為止，已收集有相當豐富的中、外文有關談基督教會史分期的專作與論文，現特別作一簡明的圖表，排比說明於下：

書名 (論文)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從中國教會發展看 教會增長 (註2)	1911 宣教佈道 全盛期	1919 本色教會 發展期	1927 中國教會 衰退期	1937 淪陷教會受 挫期	1945 1949 戰後教會 重建期
四十年來的中國教 會 (註3)	1911 檢討時期		1927 促進時期	1937 堅忍時期	1949
中國キリスト教史 研究 (註4)	1907 教會の自立、 合同の動き	1921 キリスト教中 國化運動	1927 社會變革と キリスト教	1937	
英國の對支文化事 業 (註5)	1911 辛亥革命の 極盛期	1922 反基督教運動 の勃興期	1927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註6)	1911 教勢快速成 長期	1922 壓力漸增遲緩 成長期	1937 受挫與 堅忍期	1945	1949 戰後重建期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註7)	1911 宣教新 紀元	1917 1920 民族主義下挑戰 與回應	1937 抗日戰爭下的宣教		

2. 歸納後的分期：

從上面的圖表中，可以看出中、外學者由於取舍的標準不同，因此在分期的看法上，意見頗有分歧之處，各家的分期年代頗不一致；雖然如此，若仔細的排比探求之下，異中仍有求同的餘地，從表中可以看見民國十一年（1922），民國十六年（1927），民國廿六年（1937），都被中、外學者所特別注意，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把分期的段落界定在這些年代上，因此綜合歸納各家分期之下，以重大同捨小異

註2：趙天恩著：從中國教會發展史看教會增長，世界華人教會增長研討會彙報，頁75，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香港，一九八一年六月）

註3：沈亞倫著：四十年來的中國教會，金陵神學誌第廿六卷第一、二期，頁21—29，南京金陵神學院。（南京，一九五〇）

註4：山本澄子著：中國キリスト教史研究，頁5，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東京，一九七二）

註5：東亞研究所編：諸外國の對支投資，下卷，頁47—51，東亞研究所。（東京，一九四三）

註6：K.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Vol. VII PP.371~411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Michigan, 1970)

註7：P. A. Ve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 J., 1958)

的原則，可以得出較合理而周全的分期，共有六個段落，即(一)教勢發展時期(1911~1917)，(二)討論宗教時期(1917~1922)，(三)非基運動與本色化運動時期(1922~1927)，(四)促進與合一運動時期(1927~1937)，(五)教勢受挫與堅忍時期(1937~1945)，(六)教會復興與重建時期(1945~1949)，今依序分別敘述各期歷史面貌於後。

三、教勢發展時期：(1911—1917)

1. 時代背景：

清朝宣統三年(1911)的八月十九日，亦是陽曆的十月十日，已經從事革命多年，圖謀推翻大清君主政體的革命團體，利用川路風潮的良機，乘湖北武漢地區軍隊外調入川的機會，在武昌發動了一次武裝革命，成功地佔領了武昌市，此時素與滿清政府妥協的立憲團體，也產生了民族情緒，背棄滿清而與革命派合流，故在短短的幾個月中，南方各省都次第獨立，並迅速組成了南方革命政府，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積極對北方展開統一的工作(註8)。

然而北部革命，進展不順，局面被以袁世凱為首的舊官僚集團所控制，形成了南北對峙的情形，最後雙方採和談的方式，求得了南北之統一，民主共和政府的成立，清室退位，並由袁世凱出任新政府的大總統職位(註9)，故到民國元年(1912)的二月十二日，當清朝皇室正式宣佈退位時，不但表示着一個二百六十餘年的舊王朝之結束，也表示了一個新紀元的開始——一個民主共和的政府正式開始在中國出現與運作了。

民國成立後，實行了代議政治，政黨的活動十分蓬勃，整個政治趨向是朝民主憲政之途走去，但不久即遇到一股逆流，此緣起於以袁世凱為首的舊官僚集團與昔日的革命派之間的積不相能(註10)，終於導致了民國三年(1914)二次革命的發生，但由昔日革命黨派演化而成的國民黨非袁之敵手，故未及三個月就為袁所鎮壓，至此全中國落入袁世凱的掌握控制之中，國民黨員紛紛走避海外，另謀倒袁運動。

由於袁世凱對民主共和沒有信心，也認為民主共和不適合於中國(註11)，因而想恢復帝制，於是帝制運動在民國三年到四年間(1914~1915)積極展開，到民國

註8：李守孔著：《國民革命史》，頁172—178，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台北，民國五十四年)

註9：張玉法著：《中國現代史》，上冊，頁70—71，東華書局。(台北，民國六十六年七月)。

註10：李劍農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頁361，商務印書館。(台北，民國五十一年)。

註11：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448—449，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一九七九年)。

四年的十二月十九日，袁氏接受「擁戴」，宣佈成立了中華帝國，改明年為洪憲元年(1916)；眼見帝制運動要得逞之時，幸有中華革命黨高舉反袁旗幟於前(註12)，又有以梁啟超、蔡松坡師生為主體之昔日立憲派份子傳遞反帝制之火炬於後(註13)，經迅速的蔓延而導致了全面性的反帝運動的展開，迫使袁世凱把帝制取消，不久袁也在眾叛親離之下，於民國五年(1916)的六月五日，以尿毒症去世，此後雖有黎元洪、段祺瑞等人來收拾殘局，但失去像袁那樣强有力的領導者之後，民國政局走入了分裂之途，南北各地的軍閥勢力抬頭(註14)，紛紛割地自雄，到民國六年(1917)，本期結束之時，已成軍閥政治宰割中國，四分五裂的雜亂不堪的局面了。

2. 發展的時代因素：

在上述的時代背景下，因時局的紊亂，自然影響到外交、經濟、社會與宗教各面，而情況往往都是負面多於正面，唯宗教中的基督教，却因特殊而多種因素的配合，使它的發展在本階段中，得着一段罕有的黃金時代(註15)，開展出基督教在中國的新紀元，下面就來說明這些有利於發展的幾個因素。

(1) 法律上合法地位的取得

民國肇建，民主共和政體正式確立後，一切都要以憲法為依歸，唯正式憲法的訂定與公佈施行，尚有待時日，故民國元年(1912)的二月，由參議院召集臨時約法起草會議，準備先以臨時約法暫代尚未產生的正式憲法，參議院授權宋教仁等起草，經過討論通過後，於同年的三月十一日，由政府頒佈施行，此臨時約法計有七章五十六條，其中第二章第六條項下，有如下的說明：

「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註16)

此條文正式確定並表明人民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也確定了中國基督徒有公民的地位與身份，易言之，基督教從此取得法律上合法的地位。

回憶前此在清朝時代，基督教傳入之後，皈依並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信徒，無論官紳或平民，都一律被視為「教民」，而「教民」並沒有法律上的地位，無大清王

註12：李守孔著：中華革命黨與護國軍，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四輯民初政局，頁333—336，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台北，民國六十九年)

註13：胡平生著：梁啟超與討袁護國，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四輯民初政局，頁295—302，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台北，民國六十九年)

註14：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下冊，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一九七九)

註15：趙天恩著：從中國教會發展史看教會增長，世界華人教會增長研討會彙報，頁80，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香港，一九八一年六月)

註16：吳宗慈著：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其緣起，中國現代史料選輯，民國憲政運動，頁29，正中書局。(台北，民國六十七年)

朝法律的保障，「教民」一詞不是中性不帶色彩的名詞，而是內中含有輕視與敵視而又無可奈何的意味在內，輕視與敵視來自它與傳統文化和思想不能若合符節，無可奈何則來自因基督教背後有強勁的外國在作後盾，得罪不起。易言之，「教民」是次文化（Sub-culture）中的一支（註17），也是中國環境背景中的異文化份子，清朝的法律自無保障的可能，若說「教民」的生命財產有所保障，那是依附於外國來華的宣教士後而有的，也是依附於條約保護外國傳教條款下才有的，因此「教民」在中國實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地位，身份也十分奇特故不被衆人所認同。

等到民國肇建，在民主共和政體之下，法律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從此「教民」的尷尬地位得以擺脫，而基督教在民國時代也有了新的地位，昔日依傳教條約保護的傳教活動，如今可自由宣揚，不再受限制，因此法律地位的取得，突破了長久以來基督教在中國宣教上的大瓶頸，也解脫了長久以來所不易解決的困境，為本階段基督教的發展帶來極有利的因素（註18）。

(2) 社會上參與身份被認同

基督教從清朝嘉慶十二年（1807），由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遣了馬理遜（Robert Morrison）來華傳教後，正式開啓了基督教入華之門，到清室退位（1912），共有百餘年的時間，其間の後五十年，基督教各傳教團體紛紛來到中國傳教，人力與物力的支援為數頗可觀，所以在他們全力的投入之下，沿海到內陸各處，都設立了教堂，也擁有了中國的信徒，可謂是基督教會在中國的建設期，但就整個情況說來，中國的社會仍然是傳教士眼中的一塊大頑石，成績有限，就所付出的代價而言，並不是成正比率的現象。

造成傳教成績有限的原因，乃是基督教仍未能被國人所認同，總把基督教看成是「洋教」，認為基督教教義與傳統文化有違，加上傳教士的母國，都在中國有其龐大的勢力，故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更不肯接納基督教，不僅不肯接納，更進而輕視、仇視基督教，因此衝突時起，反教事件層出不窮，雖然清朝官府努力平息教案，但都是只能謀得表面的解決，雙方的緊張關係依舊，潛伏的爆亂因子越積越多，終致有庚子年（1900）義和團事變的大爆發，不幸走上流血的悲慘結局，雙方都蒙受了創傷。

也因為有這一次的大創傷，使雙方都能在痛定思痛下，開始虛心的檢討，在基

註17：唐遠華著：基督教教會及其傳教方法在近代中國本土化之發展，頁107，師範大學碩士論文自印本，（台北，民國七十年）

註18：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頁10—14，陳春生著：基督教對於時局最近之概論，商務印書館。（上海，民國三年）

督教傳教團體方面，因着這次的流血教訓，發現本身宣教態度與政策上的許多缺失，以及可商議之處，於是改弦更張，他們更妥善安排並調整與其母國的關係，避免再被國人看做是他們國家或政府侵華的幫兇，極力掃除在國人心目中對基督教的成見，更積極努力去爭取國人對他們的好感與認同，如教會在社會關懷方面，創辦了更多的學校、醫院以及慈善機構（註19），在社會正義方面，也積極投入並參與中國社會的改革運動（註20），例如無論外國傳教士，或是中國基督教徒，都與程度不同的改革運動有密切的關係，這些具體而積極的社會參與，逐漸被國人所認同，也改變了以往對基督教一些錯誤的看法，無形中為民國後基督教的發展作了良好的鋪路工作。

民國成立後，除了獲取法律上的保障外，基督教更因許多基督教的領袖在社會上有傑出的表現而取得國人普遍的好感，許多基督教徒積極參與政治與社會的活動，以民國元年（1912）四月所召開的臨時國會而言，其中議員至少有六十位是基督教徒（註21），而內閣閣員與行政首長中，也為數可觀，自孫中山先生以下、王寵惠、王正廷、陸徵祥等人，都有濃厚的基督教背景在內（註22），因此民國以後，基督教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越來越佳，從而帶來了有利發展的因素（註23）。

（3）宣教士適時的投入與配合：

當民國的成立，為基督教帶來從未有的良好機會時，除了法律地位的取得，社會上普遍對之有好感外，宣教上適時能有大量優秀的宣教士的投入來配合，也是構成了有利於發展的因素之一。（註24）

民國成立的前後，正逢西元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一年）在美國基督教界所發起的「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發展達到高潮鼎盛的時候，「學生志願運動」中最具體的目標是「在我們這一代將福音傳遍全世界」，因此特別組成「學生海外傳教志願團」（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準備遠渡重洋，前來異教之地傳教，該運動得着傑出的領袖，如王爾德（Robert P. Wilder）、穆德（John R. Mott）等人的領導發展，加上當時幾

註19：瞿海源著：中國社會的變遷（1900—1949）——以社會階層與宗教為例，近代中國雙月刊第23期，頁143，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台北，民國七十年）

註20：陸丹林著：革命黨與基督教，革命史譯，頁110—120，獨立出版社（重慶，民國三十五年）

註21：A. P. Parker: "China's Request for Prayer" Chinese Recorder XLIV (1913), P.364.

註22：王寵惠與王正廷之父親，皆為牧師。

註23：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頁10—14，陳春生著：基督教對於時局最近之概論，商務印書館。（上海，民國三年）

註24：邵玉銘著：十九世紀初年至一九三〇年代美國基督教會（及其在中國傳教士）與美國政府間之歷史關係，東亞季刊六卷三期。（台北，民國六十四年）

位總統，如麥金萊 (William McKinley)、塔虎脫 (William H. Taft)、威爾森 (Woodrow Wilson) 的支持，以及美國基督教各教派的熱誠支持與合作，故在美國數百所的大學與神學院中，得着數千名大學生簽名，表示志願要到海外宣教；而宣教的地點選擇，到民國前五年 (1906)，第一志願地點已由過去的印度、中南半島，而易為中國了，當時的紀錄顯示約有百分之廿九的宣教士準備前來中國，而以發起此次志願宣教海外運動的一八八六年算起，到民國八年 (1919)，共有二千五百廿四位前來中國，佔全體志願人數八千一百四十位中的百分之卅一 (註25)，這些事實與紀錄都顯示了民國成立前後的幾年內，由美國前來為數頗眾的宣教士，適時地配合投入此一有利的環境，因而使基督教的傳佈可以順利的開展。

尤有進者，來華的宣教士不僅在數量上眾多，其素質也比以往來華的宣教士為好，他們來自大學與神學院，有一定的專門知識，在神學之外，不乏對教育、科技、編輯學術等方面有其專長，因此善用這些專長，在國人尚十分傾慕西方科技、教育的環境中，以此作橋樑而間接達到了有利宣教的目的。

3. 本期發展的實況

(1) 在華傳教的團體

基督教會來華求其教勢的發展，除了極少數係個人自費前來宣教者外，大多數的傳教士都是由所謂的「差會」 (Missionary Society) 所派遣出來的。差會的起源甚早，十七世紀初年已經出現，當教會有意向外地宣教時，有關傳教士的來源，對當地文化的了解，生活費用的取得，建立教會所需財源上的支持，甚而在宣教地區工作的籌劃，都需要有一個良好組織來推展一切的工作，免得事倍而功僅其半，甚而徒勞無功，此一組織即「差會」，歐美地區的教會，審度時勢之下，大都採取此種「差會」 (註26) 團體組織來發展在華的基督教事業。在本階段內，究有多少個差會團體已經在華宣教，今以所來自的國家或地區，列一詳細的圖表來說明：

(註27)

註25: C. S. Philips; "The Volunteer Movement",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J. K. Fairbank ed. (Cambridge, Mass. 1974) P.105. 又見趙亨恩著：美國學生宣教運動與中國，校園第廿卷第二期，頁4—9，校園出版社。(台北，民國六十七年)

註26: 賈禮樂 (J. Herbert Kane) 著，黃彼得譯：基督教宣教史略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頁 114—115，印尼東南亞聖道神學院。(台北，一九七九年十月)

註27: 以下係根據 1. 東亞研究所編：諸外國の對支投資，下卷，諸外國の對支文化事業，頁41—43，頁208—212所列資料。(東京，東亞研究所，昭和18年)

2. 山本澄子編著：中國キリスト教史研究，附錄部份，頁 7—11所列資料。(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

3. Milton T. Stauffer (司德敷) 編：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頁 11-13所列資料 (San Francisco, C.M.C, 1979)

A. 歐洲地區：

a. 歐洲大陸地區：德、瑞、丹、挪、芬、荷

i 德國差會：

開教年份	中國譯名	原文名稱(附英文名稱)	簡稱
1847	巴色會	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zu Basel (Basel Mission)	B
1847	禮賢會	Rhein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Rhenish Mission)	RM
1882	巴陵信義會	Berliner Missionsgesellschaft (Berlin Mission)	BN
1882	巴陵女書院	Berliner Frauen-Missionsverein (Berlin Women's Missionary Society)	B FM
1884	同善會	Allgemeiner Evangelischer 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 (Ostasien Mission) 或 (Weimar Mission)	A EDM
1890	喜迪堪會	Hildesheimer Verein für die deutsche Blinden Mission in China (Hildesheimer China-Blinden Mission)	HVCB
1894	德華盟會	Allianz-China Mission in Barmen (German China Alliance Mission in Barmen)	GCAM (CIM)
1896	北海長老教會	Kiel China Mission (Kieler China Mission)	KCM
1899	德女公會	Deutscher Frauen Missions Bund (German Women's Missionary Union)	DFMG (CIM)
1900	粵南信義會	Schleswig-Holsteinsche 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zu Brecklum (Schleswig-Holstein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	SHLM

1900	立本責信美會	Liebenzeller Mission (Liebenzell Mission)	L (C I M)
1907	肥柏基督教會	Missionshife (Verbert Mission and Society)	MH
1915	女執事會	Fiedenshort Deaconess Mission	FDM

ii 瑞典差會

開教年份	中國譯名	原文名稱(附英文名稱)	簡稱
	喜信會	Fribaptistsamfundets Mission (Scandinavian Independent Baptist Mission)	S I B M
	聖潔會	Helgelse-Förbundet (Swedish Holiness Union)	H F (C I M)
		Orebro Missionsförening (Orebro Missionary Society)	OM
	瑞華浸信會	Sällskapet Svenska Baptismisioneh (Swed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S w B M
	瑞華盟會	Svenska Allians-Missionen (Swedish Alliance Mission)	S v A M (C I M)
	瑞華信義會	Svenska Kyrkans Mission (Church of Sweden Mission)	S K M
	瑞華會	Svenska Missionen i Kina (Swedish Mission in China)	S M C (C I M)
	行道會	Svenska Missions-Förbundet (Swedish Missionary Society)	S M F

iii 挪威差會

開教年份	中國譯名	原文名稱(附英文名稱)	簡稱
	道友會	Buddhistmisjonen (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hists)	CMB

中華基督教路德會	Norsk Lutherske Kinamisjonsbund (Norwegian Lutheran China Mission Association)	N L K
信義長老會	Norske Evangelisk Lutherske Frikirkes Kinamisjon (China Mission of the Norwegian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N L F
挪威會	Norske Kinamisjon (Norwegian Mission in China)	NMC (C I M)
協力公會	Norske Misjonsalliance (Norwegian Missionary Alliance) Norske Misjonsforbund (Norwegian Mission Union)	NMA
信義會	Norske Misjonselskab (Norwegian Missionary Society)	NMS
挪華盟會	Norske Missions-Forbund (Norwegian Alliance Mission)	NMF (C I M)

iv 芬蘭差會

開教年份	中國譯名	原文名稱 (附英文名稱)	簡稱
	自由會	Fira Missionen i Finland (Finnish Free Church Mission) Saalem Lähetys (Saalem Mission)	F F C (C I M)
	信義會	Finska Missions-Sällskapet (Finnish Missionary Society)	F M C

v 丹麥差會

開教年份	中國譯名	原文名稱 (附英文名稱)	簡稱
	路德會	Danske Missions-Selskab (Danish Missionary Society)	D M S

b. 英國愛爾蘭地區：英・澳・愛・紐

i 英國地區

開教年份	中文譯名	原文名稱	簡稱
1807	倫敦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
1814	大英聖書公會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BFBS
1843	聖公會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	SPG
1844	英行教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CMS
1847	大英長老會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EPM
1853	循道會	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WMMS
1853	興漢會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CES
1859	大英浸禮會	Engl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BMS
1859	聖道公會	Methodist New Connection Missionary Society	
1862	蘇格蘭長老會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	UPCS
1863	蘇格蘭聖經會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	NBSS
1864	偕我公會	English Methodist Free Church Mission	
1865	內地會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
1869	愛爾蘭長老會 (哀長老會)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Ireland	PCI
1878	蘇格蘭福音會	Church of Scotland Foreign Mission	CSFM
1884	公誼會(公信會)	Friends'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 of England	FFMA
1884	聖公會婦女部	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	CEZMS
1889	弟兄會	Christian Mission in Many Lands (Plymouth Brethren)	CMML
1892	壽陽教會	Shou Yan Mission	

1891		Bible and Soul-Winning Prayer Union	
1892	廈門組合教會	Congresational Union of Amoy	
1893	大英浸禮會婦女部	Baptist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	BZMS
1893	烟臺工藝會	Chefoo Industrial Mission	CI
1893	基督徒公會	Christians' Mission	CM
1903	神召會	Tsehchow Mission	TSM
1907	郵局基督會	Post Office Christian Association	
1912	英五旬會	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PMU
1915	南雲南會	South Yünnan Mission	
1916	救世軍	Salvation Army	SA
1916	南寧醫療傳道會	Emmanuel Medical Mission	

ii 愛爾蘭

開教年份	中文譯名	原文名稱	簡稱
1888	都柏林大學傳道團	Dublin University Fukien Mission	

iii 紐西蘭

開教年份	中文譯名	原文名稱	簡稱
1901	紐絲綸長老會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Zealand	PCNZ

C. 美洲地區：

a. 美國地區差會：

開教年份	中國譯名	英文原名	簡稱
1830	美國公理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
1835	美國聖公會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U. S. A.)	ACM

1836	大美國浸禮會差會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North)	ABF
1836	美國南浸信傳道會	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SBC
1838	美國長老總差會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	PN
1842	大美國歸正教會	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Dutch)	RCA
1847	安息日浸禮會	Seventh-Day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SDB
1847	美以美會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orth)	MEFB
1848	監理會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South)	MES
1867	美國南長老會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South	PS
1876	美國聖經會	American Bible Society	ABS
1881	女公會	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WU
1885	基督教男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1886	基督會	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	UCMS
1887	貴格會	American Friends' Mission (Ohio Yearly Meeting)	AFO
1887	美瑞丹會 (瑞美會)	Swedish American Mission (Swed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U. S. A.)	SEFC
1888	宣道會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CMA
1889	基督同寅會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 Mission	UB
1890	北行道會	Swedish Evangelical Mission Covenant of America (Covenant Missionary Society)	SEMC
1890	基督教女青年會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
1891	鴻恩會	Hauge's Synod Mission	HSK

1890	豫鄂信義會	Lutheran United Mission (Norwegian Lutheran Church of Americ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	LUM
1892	浸禮福音會	Gospel Baptist Mission	GBM
1895	美國約老會	American Reformed Presbyterian Mission	RPC
1896	南直隸福音會	South Chihli Mission	SCM
1897	來復會	American Advent Mission Society	AAM
1897	根本論長老會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CumPM
1898	中華信義會	American Lutheran Mission of Shantung	ALM
1899	大美復初會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	RCUS
1899	恩典會	Grace Mission	GMC
1900	遵道會	United Evangelical Church Mission	UEC
1902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Seventh-Day Advent Denomination Mission	SDA
1902	遵道會	American Lutheran Brethren Mission	LB
1902	雅禮協會	Yale-in-China (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YM
1904	聖道會	Evangel Mission	EVM
1904	循理會	China Free Methodist Mission	FMA
1905	福音會	China Mennonite Mission Society	ChMMS
1905	信義會	Augustana Synod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ELAUG
1905	東亞基督教道友會 (又名廣發印書坊)	Hunan Faith Mission (Broadcast Tract Press)	BTP
1906		American Friends Board of Missions	AFBM
1906	痲瘋院	American Mission to Lepers	ML
1907	神召會	Pentecostal Missionaries	PM

1909	便以利會	Peniel Missionary Society (South China Peniel Holiness Missionary Society)	SCPH
1909	美普會	Methodist Protestant Mission	MP
1909	海面佈道會	South China Boat Mission	SCBM
1909	神的教會	Church of God Mission	CGM
1910	友愛會	Church of Brethren Mission	CBM
1910	神召福音會	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the World	PAW
1910	通聖會	National Holiness Mission	NHM
1910	使徒信心會 (又名使徒信道會)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AFM
1910	神召會 (又名上帝教會)	Assemblies of God Mission (General Council of Assemblies of God)	AG
1911	萬國四方福音會	Emmanuel Church of the Foursquare Gospel	ECFG
1911	孟那浸信會	Mennonite Brethren Church Mission	MBM
1911	美國清潔會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Mennonites of North America	MGC
1912	神召會	Pentecostal Holiness Mission	PHM
1913	路德會	Evangelical Lutheran Synod of Missouri and Other States	ELMo
1914	宣聖會	Church of the Nazarene	CN
1915		United Free Gospel Mission	UFGM
1915	希伯崙會	Hebron Mission	HeB
1915		Mid-Yunnan Bethel Mission	MYBM
1917	信義公理會	Lutheran Board of Missions (Lutheran Free Church of the U. S. A.)	LBM
1917	湖南聖經學校逐家佈道團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Book Distribution Work	BIOLA

b. 加拿大地區差會

開教年份	中國譯名	英文原名	簡稱
1871	加拿大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 of Canada	PCC
1891	英美會 (又名美道會)	General 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Canadian Methodists	MCC
1910	加拿大聖公會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Canada	MSCC
1910	聖潔會	Canadian Holiness Mission	CHM
1912	加拿大五旬會	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Canada	PAC

綜合以上各地區來華的宣教團體總數，則可作成下列圖表來說明：

國別	宣教團體數目	國別	宣教團體數目
德國	13	英國	29
荷蘭		愛爾蘭	1
丹麥	1	紐西蘭	1
挪威	8	澳洲	
瑞典	7	加拿大	5
芬蘭	2	美國	59

(2) 在華傳教團體的宗派區別

基督教在華傳教的差會團體，以所來自的國家、地區方式的區分已如上述，若將此為數上百的差會團體，就其信仰背景，教義特色，行政組織上的異同點加以歸納，則可看出此上百團體，全係由基督教的幾個大宗派（Denominations）中所衍出來的，現特將此類大宗派作一簡介，並將屬於該宗系統下的各來華差會團體列置於後，以明傳教團體的宗派區別。

A 公理宗 (Congregational Church)

該宗派於十六世紀的後期，首先出現於英國，認為每一個教會都應獨立自主，教會應由全體教徒「公眾管理」，不可受制於一人，故該宗派取其意譯而名「公理宗」，若取音譯，則譯名為「綱紀慎會」（註28）；又該宗素重信仰的內涵，故不拘

註28：莫南(Einar Molland)著，張景文，徐炳堅譯：《基督教會概覽》，頁304—309，道聲出版社。（香港，一九七九年七月）。又見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中華基督教各宗派述略，頁15—19，商務印書館。（上海，民國三年）

於義文，最早來華傳教的馬理遜牧師 (Rev. Robert Morrison)，係由倫敦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所差遣，倫敦會原屬該宗旗下，其他的來華差會團體隸屬該宗旗下者，尚有公理會 (又稱美部會)、美普會、協同公會、基督會等。

B 浸禮宗 (Baptists)

浸禮宗之得名，係因該宗十分注重把信徒全身浸入水中的浸禮儀式，並將之視為係一種信仰的表徵，其起源的歷史，若從廣義說，可以追溯到西元一世紀的初代教會時候，那時凡有施浸禮的教會都可說是屬於浸禮宗，若從狹義說，則依大英百科全書中的說明，首度採用浸禮宗一詞，係在十七世紀 (1644) 時代，當年有英、荷信徒，反對給兒童行浸禮，主張信仰基督全由個人自己的意志決定，故只有成年人才能接受浸禮，他們在教義上所堅持的論點，成為該宗派得名之由來。(註29)

浸禮宗除強調浸禮外，也主張教會要採絕對的民主制度，信徒間一律平等，不可有階級之分，來華的差會團體中，隸屬該宗旗下者，有大美國浸禮會差會 (又稱美北浸信會)，美國南浸信會傳道會 (又稱美南浸信會)，安息浸禮會、浸禮福音會、東亞基督教道友會、大英浸禮會、瑞華浸信會、大英浸禮會婦女部、孟那浸信會、友愛會等。

C 聖公宗 (Anglican Church)

聖公宗的中譯名稱，係由英文中 Holy Catholics Church 一辭翻譯而來，最初譯為「聖而公之教會」，後來改定為「聖公宗」或「聖公會」；該宗派產生的時間，大約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時候，發源地在英國，所以聖公宗教會也被稱為安立甘會 (Anglican Church)，或英國國教派，又因教會組織採監督制度 (Episcopacy)，所以也被稱為監督會。(註30)

聖公宗的教會，崇拜儀式與天主教儀式相似，但教義上則採安立甘主義 (Anglicanism)，主張包容，忠於聖經 (Holy Bible) 的權威，採行聖餐、浸禮兩種教會聖禮，組織則為三級的主教制，總之聖公宗強調安立甘主義之大公性及普世性。至於屬聖公宗旗下的來華傳教會團體，計有美國聖公會，英國聖公會，英國行教會，英聖公會婦女部，都柏林大學傳道會，加拿大聖公會、澳洲聖公會。

D 信義宗 (Lutheran Church)

信義宗之得名，係該宗派在基督教義上，最強調「因信稱義」這方面的教義，視為該宗之基本要道，因而得有「信義宗」之名；又該宗在中國也被稱做「路德宗」，「路德宗」之得名，則係由英文名稱直接音譯而來者，至於該宗取名「路德宗

註29：同註28，頁314—318。又年鑑，第一期，頁15—19。(上海，民國三年)

註30：同註28，頁151—159。又年鑑，第一期，頁15—19。(上海，民國三年)

」(Lutheran Church)，全係紀念該宗之開創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an, 1483~1546)而來。(註31)

信義宗的教會，在西元十六世紀二十年代，紛紛開始設立起來，由歐陸的地區，迅速地傳播開來，擴及於北歐及北美洲，分佈極廣，屬於該宗系統下來華傳教的差會團體為數極多，計方中華信義會、信義會、北行道會、豫鄂信義會、遵道會、路德會、信義公理會、巴色會、禮賢會、巴陵信義會、粵南信義會、瑞華信義會、瑞行道會、道友會、中華基督教路德會、信義長老會、丹麥路德會、芬蘭信義會、挪威信義會等。

E 長老宗 (Presbyterian Church)

長老宗之得名，係該宗派在教會制度的體系中，有長老制度(Presbyterate)的設立，主張教會行政由教友選出之長老來管理，該宗源自改革宗教會(Reformed Church)，故長老宗的教義與改革宗的教義，兩者並無二致，而改革宗教會乃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所建立者，故加爾文主義(Calvinism)的基本論點，如預定論(Foreordination)等也為長老宗所信奉遵從。(註32)

長老宗源自歐陸的瑞士，然後擴及法國、荷蘭、英國、美國、加拿大與紐西蘭等地，屬其旗下來華的差會團體，計有美北長老會、美國歸正教會、英國長老會、蘇格蘭長老會、美南長老會、愛爾蘭長老會、加拿大長老會、蘇格蘭福音會、基督同寅會、約老會、復初會、紐西蘭長老會、根本論長老會、北海長老教會等。

F 監理宗 (Methodist Church)

監理宗又被稱做「衛斯理宗」或「循理宗」，取名「衛斯理宗」的原因，在於該宗派的創立者名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故如同「路德宗」一般，取該宗創立者之名作為該宗派的名字；又該宗被稱做「監理宗」或「循道宗」的原因，則在於該宗的英文原名Methodist Church的本意，有循規蹈矩，有條有理的意思在內，故將之意譯而得「監理宗」、「循道宗」之名。(註33)

監理宗的教會組織採監督制，最大的立法權，係操之於由各教會聯合組成的大議會上，在信仰及教義上，該宗法十分注重個人靈性上的保證，強調要保守住因信稱義而蒙救贖的得救之道。監理宗的發源地在英國，自十八世紀成立後，向美國、加拿大等地發展，擁有極多的教友。

該宗旗下所屬來華的差會團體，計有美以美會、美國監理會、循理會、美普會

註31：同註28，頁196—200。又年鑑第一期，頁15—19。(上海，民國三年)

註32：同註28，頁267—269。又年鑑第一期，頁15—19。(上海，民國三年)

註33：同註28，頁290—294，又年鑑第一期，頁15—19。(上海，民國三年)

、聖道公會、循道會、偕我公會、加拿大美道會等八個。

G 五旬節派 (Pentecostals)

五旬節派系統的教會，是廿世紀初年時代 (1907~1908)，由基督教各宗派中的一些教會，在追求如初代教會 (一世紀時) 所發生的靈洗 (Baptism of the Spirit) 經驗後，於是脫離原來所屬的宗派，另行組合的新教會系統，取名「五旬節派」的緣故，緣起該等教會所追求與渴慕的靈洗經驗，在初代教會時期，係於猶太人的五旬節期 (Pentecostal) 所發生的，所得有此名稱。(註34)

五旬節派既重視靈洗經驗，故亦重視一些看來令人驚奇的現象，例如說方言 (Tongues)，神醫治病或稱憑信心醫病等現象，一般言之，五旬節派可以說是來自基督教本身的一次復振運動 (Revitalization Process) 下的產物。

屬於五旬節派來華傳教的團體，計有神召會、宣聖會、聖通會、神召會福音會、使徒信心會、便以利會、聖潔會、英國神召會、英國五旬會、加拿大聖潔會、加拿大五旬會、上帝教會。

H 門諾派 (Mennonite)

門諾派，係於十六世紀時，有荷蘭的天主教修士名西門，門諾 (Menno Simons, 1496~1561) 者，因讀新約全書 (New Testament) 與路德著作後，教義思想起了變化，開始趨向於重洗派 (Anabaptists) 的主張，亦即主張洗禮應在認信之後 (註35)，並且主張和平，拒絕從軍作戰，門諾的跟從者日漸增多，故組成了門諾教派，由荷蘭而至英美等地都有教會的組成，而以在美國的發展最為理想。

門諾派與浸禮宗是同出一源，日後異途分別發展，其來華的差會團體，計有福音會、卓資山福音會、美國清潔會等團體。

I 復臨派 (Adventists)

復臨派的淵源歷史，可上追至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當時教會中有些信徒與神職人員，深信在不久的將來，基督耶穌將以肉身復臨世界 (註36)，於是離開原來的教會，而組成復臨派的教會，事實上，觀其教會政體，是公理宗體制，對洗禮的措施，則為浸禮宗的見解，教義上與所有基督教系統中的新教 (Protestant) 也大致相同，但對新舊兩約 (Holy Bible) 中的啟示與推測，有出奇的偏好。

屬於復臨派旗下，其來華傳教的差會團體，計有來復會與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等二個團體。

註34：同註28，頁326—330。

註35：鄧肇明輯：英漢宗教字典，頁182，門諾派條，香港道聲出版社。(香港，1975年)

註36：同註28，頁344—350

J 內地會 (China Inland Mission)

內地會原不是一個基督教的宗派，因為它既無宗派教會那樣子地強調其所堅持的某種神學與教義的立場，也無宗派教會那樣有堅強的差會組織，能作人力、物力上的各種支援，故內地會在中國傳教，基本上它不會造成宗派色彩濃厚的教會，而是超越宗派者。

內地會純粹是一班熱心宣教工作的教士們，自由組織成的佈道團體，目的在協助建立中國自主、自傳、自養的教會，所以只要基於此一共同的信念之下，很可能有來自不同背景的宗派教會願意加入（註37），因此內地會本身是超越於各宗派之上的。

內地會只對中國地區的百姓宣教，由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所創立，他經過多次的旅行歐、美各地，受其感召的教會與信徒，都樂意加入對中國宣教的行列，紛紛隸歸於內地會的組織之下，受其安排並行動，這類的教會自己不再組織差會，願意聽憑內地會的指使；屬於此類的教會團體共有內地會、德國女執事會、德華盟會、德國立本賁會、德女公會、芬蘭自由會、挪華盟會、瑞聖潔會、瑞華會、瑞華盟會，北美瑞挪會等十餘個團體。（註38）

K 專門性的差會團體 (The Specialized Missions)

這一類的差會團體，也是超宗派，專門對某一類的中國百姓宣教或服務者，例如對聾人、對盲人、對軍人、對青年人、對兒童、對痲瘋患等，他們在中國設立的團體有基督教男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痲瘋院（American Missions to Lepers），雅禮協會，美華聖經會，海面佈道會（South China Boat Mission），濟良會（Door of Hope & Child Refuge）等。

L 其他

凡不屬於宗派，又非專門性的差會團體，例如救世軍、貴格會、希伯崙會、萬國四方福音會、救恩會、湖南聖經學校等（註39），也都派有宣教士前來中國，這些團體雖各有其特點，但各自獨立，與宗派亦無淵源關係，特歸納於此。

(3) 教會的對內成就

本階段期內，教勢的發展，有幾項成就比較值得稱道，就教會對內的成就而言

註37: Marshall Broomhall (海恩波) 著: *The Jubile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國內地會創立五十金禧週年故事) P263—P267 *China Inland Mission* (Philadelphia, 1915)

註38: 王治心主編: *神學誌特號*, 中華基督教歷史乙編, 內地會歷史, 頁111—114, 金陵神學院出版。(南京, 民國十四)

註39: 東亞研究所編: *諸外國の對支投資*, 下卷, 諸外國の對支文化事業, 頁210—212, 日本東亞研究所。(東京, 昭和十八年三月)

，有合一運動的推展，全國性會議的召開，自立教會的產生，文字工作的推展等四項，現逐一作說明於後：

A. 合一運動 (Ecumenical) 的推展

「合一運動」是針對來華傳教的宗派教會過於繁雜下，以致有惡性競爭的惡果後，在教會內部引起自覺的一種正面反應，期望透過合一運動而能避免以往種種事倍功半的不良後果。

原來自清咸豐八年(1858)和十年(1860)所訂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中允許基督教進入中國內陸地建教堂(註40)，自由傳教之後，各國基督教的宗派教會團體都紛紛差派傳教士入華傳教，這些由各宗派教會差派來的傳教士們，很自然地把在歐美當地的宗派觀念，宗派組織形態等帶入了中國而產生了許多宗派性的教會。

數十年下來，宗派性教會林立於中國，彼此不相統屬，又不相來往，下焉者，則互相攻訐，作惡性的競爭，許多不正常的現象都陸續顯現出來，例如不同的宗派教會，對於闡釋教義的聖經，竟要用不同的中文聖經翻譯本，並用不同的詩歌翻譯本(註41)，這些現象都徒增教外人仕對基督教的反感，也完全暴露基督教會界內部分歧之嚴重性。

歐美地區基督教宗派林立，有他們文化上、歷史上、地理上、制度上的原因，然後逐漸自然形成者；然則傳教至一新的地區如中國者，實無必要再將歐美這種林立的宗派觀念，宗派制度帶入，此不但使正面傳教的成果不能彰顯出來，反倒使負面的影響，斷傷到教會不能正常地運作，却會帶給基督會中無可彌補的損失。

這種教會史上悲劇的異地重演，使教會界中的有識之士開始有所覺悟，深深覺得謀求宗派教會間的合一(Union)，實有其必要，也深刻體認到教會間的合一，是解決宗派林立之下所產生負面影響的唯一方法，於是合一運動於焉展開，而所採取的途徑方法有二：

a. 宗派的間合一運動：

採此一途徑的程序，係先採各宗派各自系統下的教會求得合一，再將兩宗派間求得合一，亦即先求在教義，組織制度等相近宗派間的合一，最後求所有宗派間的合一。

這種方式的合一運動，在本階段(1911~1917)之前，已經在國內進行，並有

註40：蔡乃煌撰：約章分類輯要，卷六上，傳教門，傳教類，頁3，湖南商務局。(湖南，光緒庚子廿六年)

註41：Williamson, A: Missionary Organization in china., Chinese Recorder 20:1 (1889)，頁18--24。

很好的成績，例如長老宗旗下的各教會，已於光緒卅一年（1905）合一完成，組成中國基督聖教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of China）（註42），而在本階段期間，則又有聖公宗旗下的各教會，於民國元年（1912）四月組成了中華聖公會（Holy Catholic Church of China）（註43）；信義宗旗下的大部份教會，於民國六年（1917），組成中華信義會（Lutheran Church of China）（註44），成績至為豐碩，唯兩宗派間的合一運動，尚未在本階段期間內有所進展，有待繼續努力。

b. 透過超宗派組織的合一運動

合一運動的第二條途徑，係透過一些超宗派的專門性教會團體或機構，例如青年會（Y.M.C.A）（註45），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基督教勉勵會（Christian Endeavor Society）（註46）等組織去完成的，由於這些團體在立場上都係超越於宗派之上，故能吸收各宗派信徒的參與，從事一專門類的活動，故無形中已在各宗派教會間扮演了彼此溝通的角色，因而增進了各宗派間的接觸機會，間接地促成教會間的合一。

上述這些超越宗派的基督教機構，都在本階段的時間內，在華積極展開工作，因而也在本階段的時期內，使合一運動有了非常理想的進展，以青年會為例，青年會早在清光緒十一年（1885），於福州、通州等地的教會學校中設立，以後各地的學校紛紛跟進，數目早已超過一百個，但都屬學校青年會（註47），以致所發生的影響力，僅及於青年學生，其後到光緒十五年（1889），第一個城市青年會於上海成立，隨後北京、天津、南京、重慶、成都等地也陸續成立了城市青年會，其影響力就擴大了許多，在各宗派的信徒間，充分地承擔媒介溝通的角色，但因青年會本身缺乏全國性的組織，故仍有所限制，到民國元年（1912），青年會一方面向政府立案，一方面積極促成全國性青年會組織的產生，果然立案後不久，結合學校青年會與都市青年會於一，正式取名「中華基督教青年全國組合」，至此組織已日臻完善。

註42：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頁23—24，賈玉銘著，中華全國長老會聯合總會之成立，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民國三年）

註43：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頁20—22，胡厚齋著，中華聖公會，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民國三年）

註44：中華信義會編：《信義報二十週年紀念特刊》，頁154—165，陳金鏞著，二十年來之中國教會，湖北漢口信義報社出版。（漢口，民國十二年）

註45：同註42，頁94—96，范子美著：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各處之成績，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民國三年）。又見顧長聲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頁296—301，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一九八一年四月）

註46：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一期，陳和相著，兩年來中國勉勵會事工概況，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民國二十年）

註47：同註45。

健全，事業就容易發揚，聲望日增，影響力也就越大，到民國四年（1915）更名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 M. C. A. of China）（註48），至此在全國性統一的組織領導之下，積極推動了許多超越宗派界限的聯合工作，默默地為日後的合一運動貢獻出它的力量。

其他的團體，如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W.S.C.F），成立於光緒廿一年（1895），設立於瑞士，民國二年（1913）在中國成立同盟支部（註49），展開學生方面的工作，易言之，在本階段期間內，積極開展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其努力的對象由一般的青年縮小至青年的學生，範圍雖縮小，却是一項超越宗派，為合一運動鋪路的工作；基督教勉勵會則從光緒十一年（1885）於福州地區成立後，隨後擴及於全國，各大都市皆有設立，且迅速產生全國性的勉勵會組織（1893），此後在上海的勉勵會協會，領導各地分會，以超越宗派的立場，從事勉勵信徒投身與參與教會的工作（註50），可謂不遺餘力，也對合一運動的推進大有裨益。

B. 全國性會議的召開：

基督教在中國舉行各宗派教會間的全國性會議，始於清光緒三年（1877）（註51），時距基督教入華首度傳教已有七十年之隔，此亦可見召開全國性會議之不易，該次會議地點在上海，有一四二位代表參加，然無華人代表參加；十三年後（1890），始有第二次基督教全國性會議的召開，地點仍在上海，出席代表共四四五人，僅有二位華人代表（註52）；又渡過十三年之後（1907），第三次基督教全國大會在上海召開，是年的大會也是慶祝基督教入華的金禧年大會（1807~1907），出席代表共一一八六位，其中只有五位中國人（註53），入華傳教已屆百年，只得三次全國性的大會之召開，且盡是外國傳教士的天下，這些事實已道盡百年來基督教入華傳教的真相了，教勢發展緩慢，個中原因亦不難在以上的事實中尋得合理的解答了。

自民國肇建，進入本階段時期後，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影響到各方面的變動，基督教自然也受到這項衝擊，把緩慢步調作了調整，而自治與自理的呼聲，也需中

註48：Timothy Ting Fang Lew（劉廷芳），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Protestant Auspices, PP 1542—1544,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5—36)

註49：謝扶雅著：顧子仁與學運，頁11—13。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香港，一九七三）

註50：同註46。

註51：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877, PP. 1—10,（台北，成文1973翻印）

註52：湯清編：中國基督教歷史大事年表，一八九〇年條下，（台北，基督教論壇報，第七四二期，民國六十九年一月十三日）

註53：湯清編：中國基督教歷史大事年表，一九〇七年條下。（台北，基督教論壇報，第七四四期，民國六十九年一月廿七日）

外教會人仕冷靜地坐談對話；另一方面，在民國成立的前一年（1910），有全球性的世界宣教大會（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的召開（註54），地點在英國的愛丁堡（Edinburgh），會議結束後，即派代表至各國推廣此次宣教大會的使命與精神，要傳遞此項大會的使命與精神給中國，最好的方法莫如召集在華的傳教士，不分中外，聚集一堂，舉行全國性的會議了。

經過籌備，順利在民國成立的第二年（1913），於上海召開基督教第四次全國大會（註55），距上次的全國大會只隔七年，大大地縮短了兩次全國大會之間的距離，表明基督教界在跨入新的一個階段。

此次全國大會的召開，意義十分不凡，雖然出席的人數只有百二十人左右（註56），但中外教士出席的比例上，已形成二與一之比，與前三次中外出席人員間懸殊的現象，真不可以道理計，大會中並決議每兩年召集會員常年大會一次，又決議開始做調查與研究工作，依據陳金鏞所著「二十年來之中國教會」一文中的記載說：

「這年全國大會的議案，如中國教會統一之預備，中國信徒之領袖教會事業，教會地點之分佈，西國佈道會與中國教會的佈道事業，教會之教育事業，教會對於女界之責任，基督教的出版書籍，教會之行醫事業，教會事業之通力合作，種種問題，皆有詳細的報告，和縝密的討論。」（註57）

顯見此次全國性的教會會議，不但促進了教會間的合一運動，而且有許多具體的議案付諸實現，表明教會已經能動員起來，從此將邁開步伐前進，易言之，全國的教會已經藉由此次全國性會議的順利召開，不但吸取了經驗，而且得著彼此的勉勵，因此使教會整個態勢，又轉變到一個可以再出發的形態了。

C. 全國常設機構的設立

全國教會謀求整體的發展，除了召開全國性的會議，聚集一堂共同研商外，會議之後繼續促進的工作，更為重要，以往基督教雖然在華舉行了三次（1877，1890，1907）全國性的會議，可是受到種種的限制，始終沒有常設機構的設立，以推動非會議期中有待進行的工作，因此大為影響整個教勢的發展。（註58）

在本階段期間內，能由醞釀到常設機構的正式設立，得著世界基督教宣教大會

註54：司徒焯正著，近代神學七大路線，頁126—139，香港證道出版社。（香港，1978年）。

註55：中華續行委辦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頁19—20，全國大會議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民國三年）

註56：湯清編：中國基督教歷史大事年表，一九一三年條下。（台北，基督教論壇報，第七四五期，民國六十九年二月七日），又見註44，陳金鏞著：二十年來之中國教會，頁154。（滬口，民國十二年）

註57：同註44，陳金鏞著：二十年來之中國教會，頁154。

註58：袁訪賚著：余日章傳，第七章服務基督教會，頁80—83。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台北，一九七〇）

續行委辦會 (The Continuation Committee of 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的委員長穆德 (John Mott 1865~1955) 的積極推動，應為其中的主要原因(註59)，穆德親來中國奔走，進行說服與溝通的工作，再加上一些客觀有利因素的配合，諸如教會本身的覺悟，適當人才可資使用推動，使得中華基督教續行委辦會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在民國二年 (1913) 第四次全國基督教大會中，獲得通過成立，而中國基督教會中第一個常設機構於焉成立。

「中華基督教續行委辦會」此一常設機構，所擔負的任務有五：(一)執行全國大會的決議案，(二)作中西溝通的機關，(三)提倡各教會通力合作的事業，(四)發表教會公共的意見，(五)備各教會的諮問。會址設於全國交通、商業中心的上海市，並聘請在基督教會界卓有聲譽的誠靜怡 (1881~1939) 為總幹事，編理一切事務。(註60)

中華基督教續行委辦會自成立後，以常設機構形態，忠誠執行所負托的任務，使教會間的合作事務進行極為順利，作成了不少的事工，特別是在調查和研究方面的工作最有成績，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於民國三年 (1914) 由續行委辦會編輯後出版，以後陸續出版各年度的教會年鑑，為教會與社會提供了極具價值的資料；然而續行委辦會就其性質而言，並非是處發號施令的地位，無操縱中國教會的大權，乃是純粹以贊助身份，助中國教會各種事工的進行，最大的貢獻，乃在於「全國基督教因它的服務，在各項共進的事業上有了很多的進展。」

D. 自立教會的產生

自立教會並非在本階段時間內 (1911~1917) 才首次產生，早在民國成立之前的清末已產生，但自立教會的發展蔚成一種風氣，在全中國各地逞現蓬勃地發展，都是在本階段時期之內的。

所謂的自立教會 (Independent Church)，指的是西方差會團體在華傳教所建立的教會，在發展到一個階段之後，脫離外國差會，自己獨立出來，走自傳、自養、自立途徑的教會；自立教會產生的背景，不外是要除去基督教的「外國色彩」，消除中國基督教徒與中國同胞之間的隔膜等動機而產生的。

自立教會的出現，早在同治元年 (1862) 就有閩南長老會首開記錄，脫離英與美的長老會差會，組織了自主廈門教會(註61)，其後到光緒廿八年 (1902)，有一

註59：中華續行委辦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頁19—20。全國大會議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民國三年)。

註60：中華續行委辦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頁140—146。委辦會幹事著，中華續行委辦會述略，又該年鑑附錄之二，錄有基督教全國大會所組成中華續行委辦會之章程，委辦名單等項。

註61：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國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頁31—32，許聲炎著：閩南長老會自立自養歷史，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民國三年)

批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的平信徒 (laymen)，如謝洪賓 (1873~1916)、高鳳池、宋耀如 (1886~1918)、黃家柵等人，為把基督教的消息傳到外國差會傳教士不能接觸到的地方，並且要建立獨立自養的教會，因而組成一個名叫「基督徒會」 (Chinese Christian Union) 於上海，發佈「基督徒報」季刊，其後於光緒卅二年 (1906)，基督徒會中的俞國楨 (宗周)，注重挽回教權，而另創「中國耶穌教自立會」 (註62)，表明自立教會在華中地區發展的情形，而在華北地區，則有酬恩佈道會，係由山東登州的文會館 (Teng Chow College) 畢業校友組成，往後演變擴展而成「中華基督教會」。

以上華南的「閩南長老會」，華中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華北的「中華基督教會」等三個地區的自立教會，正好代表著自立教會的三種模式，華南的「閩南長老會」模式，係由差會自動協助，走上自立的途徑，故與差會仍維持著關係；華中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模式，則採完全與差會脫離干係，脫離外國傳教士控制的純獨立形態；華北的「中華基督教會」模式，係由平信徒發起的教會 (註63)，其與差會，外國傳教士之間無任何干係，亦無任何的衝突，彼此尚能維持合作。

自立教會的三種模式在本期來臨之前，都已在中國產生，唯數量很少，進入民國時代的本階段，受到革命成功，民國肇造的影響，教會信徒自受民族主義思潮的衝擊，教會自立運動很自然地在此時期熾熱起來，於是配合主客觀的環境，建立了上述三種模式的自立教會來，

依據有關的資料統計，在本階段內自立教會增長的情形，再作如下的簡略說明：

(1)「閩南長老會」系統下的自立教會，到本階段末的年份 (1917)，數目有四十個，教友人數則達四仟玖佰餘人。(註64)

(2)「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在民國元年 (1912)，已向溫洲、潮洲、吉林、海門、明洪、三陽店等地建立自立教會，教友人數已達千餘人，為鼓吹自立教會，還出版「聖刊」月刊。(註65)

(3)「基督徒會」在民國元年 (1912)，已在湖南、湖北、山西、四川、江西、福建、廣東、江蘇、安徽、直隸、吉林、香港、舊金山、日本等地成立分堂，共有

註62：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一期，柴連復著：《中國耶穌教自立會》，頁92—94，又劉思義著：《山東中華基督教自立會》，頁95。

註63：趙天恩著：《上海獨立教會的模式》，《世界華人教會增長研討會彙報》，頁231，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香港，一九八一年六月)

註64：同註63，趙天恩著：《閩南自養教會的典範》，頁239。

註65：同註62。

會友約一千八百餘人。(註66)

(4)「中華基督教會」在民國元年(1912)時，在華北的山東有很好的開展，當時山東省政當局，對收回教權，從事自主運動，贊助甚力，還特地撥濟南商埠之區土地，允許建教堂戶舍，學校與醫院，往後山東省內的濟南、煙臺、青島、和華北的天津、北京都設立自主教會，紛紛加入，教友人數已達二千餘人。(註67)

總之，在本階段展開的教會自立連動，受民國革命成功的鼓舞，民族思想的啓發而得蓬勃發展，而自立教會順利產生後，又帶給當時教會一個新的認同，基督教可以不是洋教，也可以不再是西方差會的附屬品，意識上、觀念上的改變，成為日後中國基督教推展的一股原動力。

E. 文宣工作的展開

基督教在華的傳教方式中，以文字方式宣教最被普遍使用，文字方式的佈道傳教，可以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無遠弗屆，其影響面之深廣，也是其他方式所無法比擬的，因此在清季時代，文字宣教方式已被重視而積極使用著。

茲據光緒三年(1877)在上海舉行的在華第一次全國教會大會中的有關報告，文字出版方面的統計，計四十三種佈道書，五百廿一種神學書，廿五種傳記書，八十三種讚美詩，而福音單張則有一百零一種之多(註68)，質與量較十年前(1867)為多為好。

民國成立，除舊佈新，呈現新氣象，基督教的發展在此新時代與新的政治局面下，也已取得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教會當局自然把握此一有利的環境，作多方面的努力，文字工作素受重視，如今更是傾力促進其蓬勃的發展，青年會中負責出版事宜的謝洪賓，曾在民國三年出版的教會年鑑上說：

「近年以來，教會之出版家益衆，出品亦益繁，四方同志，每苦限於地域，不能一一知悉……。」(註69)

接着又分析民國二年到民國三年(1913~1919)，出版「聖經解釋」書廿一種，「要通專論」書十種，「史傳記事」書廿三種，「布道應用」書卅七種，「訓幼」書十種，「故事」書九種，此外尚有定期期刊約有卅餘種，比較著名的期刊有通問報(週刊，1902創刊)女鐸報(月刊，1912創刊)，時兆月報(月刊，1904創刊)，聖公會報(半月刊，1907創刊)，聖報(月刊，1908創刊)，聖經報(月刊，1912創刊)，福幼報(月刊，1914創刊)，真光雜誌(月刊，1904創刊)，進步雜誌(月

註66：同註63。

註67：同註62，劉思義著，山東中華基督教自立會，頁95。

註68：同註51。

註69：同註61。頁112。

刊，1912創刊），信義雜誌（月刊，1913創刊），顯示整個基督教出版界都有著覺醒。至於基督教的出版機構，最主要的有下列幾個，如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887），聖教書會（Chinese Tract Society 1878），美華書館（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中國主日學合會（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 1910），基督教青年會組合編輯部，通俗教育社，和廣州浸信會印書局，廣西梧州宣道書局等（註70），這些出版機構都在本階段的開始時，調整出版方針，積極配合有利的時機而大量地出書。

整個本階段期間後期內，各年書籍與期刊的出版數量資料，曾有湯因先生作成統計資料如下：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書籍出版	186	159	75	119	66
中英文雜誌	25	44	47	54	73

（註71）

以上的統計數字，再次顯示了基督教於本階段期內，所致力文字方面推展工作，在量上的增加情形。

再以出版書籍的質地來說，本期內英文編印的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 1868），上承歷年以來優良的編輯傳統，一直保持良好的聲譽，擁有許多的讀者，內容的豐富，也成為後日研究教會史的最主要的史料。而續行委辦會所編輯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以中文編就，也為教會史積存豐富的史料（註72）；此外續行委辦會商請外人編撰成的「教會書報目錄彙編」，於民國五年（1916）進行調查編纂，二年後（1918）完成，這是上距清同治六年（1867）之時，由偉烈亞力編成「中華基督教文字索引」後，同類性質的工具書之首度再現，所嘉惠於研究上的方便，實非筆墨可以形容。若說有所不足之處，則編譯書籍充斥，創作書籍仍嫌不足，有待努力。

（4）教會的對外成就：

本階段期內，教勢的發展上，就教會對外的成就而言，則有反孔教為國教，教會大學的陸續成立，醫藥慈惠，社會改良之擴大推展等四項，現在再逐一作說明於

註70：同註61。頁112—113。

註71：轉引自應元道著，四十年來之中國基督教文字事業，金陵神學誌第廿六卷第一、二期，頁76—78，南京金陵神學院，（南京，一九五〇）

註72：同註71。

後：

A. 反孔教爲國教

自民國成立之後，雖然在臨時約法中，以及憲法草案中（註73），都規定在宗教上，採取信仰自由之原則，但有部份保守人仕始終有謀求儒學勢力之復辟的企圖，特別在袁世凱當政的時代裏，醞釀把儒家學說變爲宗教，要把儒教（孔教）擁立回昔日國教的地位，易言之，有一股反宗教自由的逆流，在民初時候湧現出來，構成了對宗教自由的一種威脅。

民初儒教謀求重登國教的寶座，自非一蹴可及，有待逐步地去完成，先有民元年（1912）時，康有爲、沈曾植、梁鼎芬等在上海創立孔教會的組織，開始活動，然後透過國會議員的提案，謀求在國會中獲得通過，奠定它國教的地位，民國二年（1913），由黎元洪電請參、衆兩院速定孔教爲國教，議案中曾強調國教訂定後，可「藉籠人心，以息邪說」，同年的制憲會議中，又運動了進步黨人仕，提議把孔教訂爲國教；到了同年底，黎元洪又電請總統袁世凱，請總統通令全國學校一律設立崇祀，爲孔教爲國教的實現而再度鋪路，結果這些企圖都沒有成功，制憲會議討論時，曾遭多數黨的國民黨之反對，所以憲法草案中只列有一個妥協性的條款：以孔道爲培養國民人格的基本而已（註74），繼續維持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

民國三年（1914），袁世凱已全面控制了中國，也控制了國會，於是有一連串的尊孔行動的展開，如政治會議中提出祭天祀孔案，得蒙通過後，就宣佈了崇聖典例，又公佈了祀孔令，到是年冬天，袁世凱親來天壇舉行了祀天的典禮，又立孔令詒爲奉祀官，這一切都爲孔教之能成爲國教，作了更進一步的努力。

袁氏稱帝後，借助袁氏之力，本來可以實現他們的企圖，但袁氏稱帝未久，就有蔡梁師生的反袁，加上原來就反袁的中華革命黨之積極活動，所以在一片反對的聲浪下，袁世凱爲自己的前途作困獸之鬪，自然無暇顧及於其他，對孔教設立爲國教之事，更是力不從心，然而民間保守人仕，對孔教復辟並未停止活動，他們再度於帝制結束後，國會恢復以後，積極活動，再度寫信給新總統黎元洪，又提交國會討論，當時鼓吹提倡最力者，有康有爲、陳煥章等人。

康有爲寫信給黎元洪總統的信函中，曾爲孔教地位的確立，提出三項主張如下：

- （a）從縣長到總統各級官吏，都要按時祀孔，並向聖像叩頭。

註73：王寵惠著：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下篇憲法草案，胡春惠編，民國憲政運動，頁81，正中書局。（台北，民六十七年）

註74：同註73。

(b) 從小校到大學的學生都要讀儒家經典。

(c) 國家應設立孔教堂。(註75)

面對孔教的復辟活動日趨積極，以其影響約法中「人民宗教信仰自由」條款殊大，因此激起了基督教會的反擊，在民國五年（1916）十一月，教會中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徐謙（季龍）、誠靜怡等人，列名發起組織了「信教自由會」，聯合各教會在北京首先發難，對孔教會的活動，提出抗議，爲了擴大其影響力，還邀請了東正教、回教、佛教及其他非宗教人士前來加入「信教自由會」(註76)，期望以團體的力量來對抗孔教的復辟運動。

除了「信教自由會」之外，居於北京的基督教徒，還特地發起並展開所謂的「對抗運動」以爭取宗教自由，他們更派代表遠赴各省推展此一運動，而各省的教會領袖，如廣西教會領袖聶承益、羅運炎等，湖南代表黃瑞祥、上海代表余士廉均曾趕到北京，以襄助此一運動之推展。(註77)

到民國六年（1916）的二月，國會經過了連串的激辯之後，透過投票方式，正式否決了立孔爲國教的提案，使基督教會在反孔教爲國教的運動中獲得勝利。五月，更乘勝進擊，在國會中，把立孔教爲各小學倫理教育的建議否決掉，獲得又一次的勝利，也確保了中華民國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條文於不墜。

B. 高等教育的推廣

基督教會推廣教育的歷史由來已久，原來創辦學校的目的與動機，純係對內的需要所致，一則提供已皈依基督教信仰的教友子弟有讀書教育的場所，二則可以避免去崇拜孔子等儀式的麻煩，三則有了訓練基督教本身傳教與教會人才的培養所。

往後的發展中，基督教會發現到推廣教育，也是佈教的良好媒體之一，可以藉學校中基督教氣氛較濃厚的環境裏，培養出信仰的生活，頗能收潛移默化之功，加之學校發展之後，自然會產生許多服務教會的人才來，其反饋於基督教會，給基督教會帶來之利益多矣，因此無論對內與對外的需要上，推廣教育實有必要，基督教會遂認真地由小學、中學、大學逐步去發展，到本階段的民初時代，已經致力於大學階段的學校發展了。

大學階段亦即是高等教育階段，到本階段時期內（1911~1917），無論質與量，都有進步，在此時期之前，共有十六所學校，計山東濰縣的廣文學堂(Shantung Union College 1904)，青州的神道學校(Gotch-Robinson Theological College

註75：同註9，頁309。

註76：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五期，頁5，上海廣學會，（上海，一九一八）

註77：同註76。

), 濟南的共合醫道學校 (Union Medical College), 浙江杭州的長老會學院 (Hangchow Prebyterian College 1897), 江蘇上海的聖約翰大學 (St. John's University 1906), 上海的海浸會書院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 1906), 南京的金陵大學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10), 蘇州的東吳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1901), 廣東廣州的嶺南學堂 (Canton Christian Couege 1904), 湖北武昌的文華大學 (Boone University 1903), 武昌的博文書院 (Wesley College 1885), 漢口的博學書院 (John Griffith College 1899), 河北北京的滙文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1888), 通州的協和大學 (North China College of Tungchow 1889), 北京的華北女子協和大學 (The North China Union Woman's College 1905), 成都的華西協合大學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1910) (註78)。

進入民國以後, 在本階段的六年內, 山東的廣文、神道、共合醫道三校, 於民國六年 (1917) 合併成一所全備的大學——齊魯大學 (Cheloo University), 浙江杭州的長老會學院擴充為之江文理學院 (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 時間在宣統三年 (1911); 上海的海浸會書院, 於民國四年 (1915) 也擴充而成滬江大學 (University of Shanghai); 廣州的嶺南學堂也於民國五年 (1916) 擴充為文理學院; 蘇州的東吳大學於民國四年 (1915), 在上海增設法科; 上海的聖約翰大學, 於民國三年 (1914), 把原設在廣州的賓西佛尼亞醫學校 (Pennsylvania Medical School) 合併, 擴充原有的醫學院; 南京的金陵大學, 於民國五年 (1916), 移往南京鼓樓地區的新校區, 使該校有了日後再發展的餘地。

而在本階段內新增設的大學, 則有湖南長沙的雅禮大學 (Yale University 1914); 湖南岳陽湖濱大學 (Huping University 1917); 福建福州的福建協合大學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1916); 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 (Ginling College 1915), 長沙的湘雅醫學院 (Hunan Yale Medical School 1914); 福州的華南女子文理學院 (Hua Nan College 1914) 等校。

綜合上述高等教育的發展, 到本階段結束年 (1917) 時, 國內由教會所支持創辦的大學, 共有廿一所, 作成統計表於下:

- 華北區
1. 北京滙文大學
 2. 通州協和大學
 3. 北京華北女子大學

註78: 東亞研究所編: 諸外國の對支投資, 下冊, 頁485—491, 東亞研究所, (東京, 一九四三)。

註79: 同註79。

4. 濟協齊魯大學
5. 北京協和醫學院
- 華東區 6. 南京金陵大學
7. 南京金陵女子大學
8. 蘇州東吳大學
9. 上海聖約翰大學
10. 上海滬江大學
11. 杭州之江文理學院
- 華南區 12. 廣州嶺南文理學院
13. 福州協和大學
14. 福州華南女子文理學院
- 華中區 15. 武昌文華大學
16. 武昌博文書院
17. 漢口博學書院
18. 長沙雅禮大學
19. 岳陽湖濱大學
20. 長沙湘雅醫學院
- 華西區 21. 成都華西協和大學

C. 醫療事業之積極推廣

基督教會從事醫療事業，其歷史也是淵源流長，以醫療診治病人係最佳傳教媒體之一，基督教每能因醫院的設立，藉診治病人的機會，而接觸到一批批的中國同胞，從而開啓傳道佈教之門；而求診治的同胞們，通常都會因身體的病痛，影響到心理的健康，心靈上特別顯得脆弱無比，亟需慰藉，此時兼有專門醫學知識與基督信仰知識的醫療傳教士，便能在診治病患時，適時把信仰的種子播散在這些病患的心目中，隨後診治病患，使之痊癒，病患每能因此加增對醫院，對醫療傳教士之好感與信心，從而見賢思齊，樂意接受而皈依，達到了佈教的目的，是故醫療事業，在基督教會內視為佈教的工具，也視為佈教的先驅工作，與推廣教育，慈惠工作並稱三種最有效的佈教方法。

在本階段期間內，對於醫療事業的積極推廣，在繼承上一期的成果與基礎下，有更令人滿意的表現，民國二年（1913）的全國基督教會議中，曾會商有關教會與醫療的事項，並作出了許多新的決定，這些決議，包括肯定醫療工作對教會的價值與功用外，還肯定了發展醫學教育的重要性，注意教會醫院設立時地區分佈之普及

性，以及在日後推展醫療工作中，華人接棒的必然性等，充分顯出這次會議的召開有其不平凡的意義，日後本階段的醫療工作的推展，都係依據此次會議的決議為準繩的。(註80)

醫療事業發展到本期段時期，全國的教會醫院教目已達二六四所，而在本期新建立的則達十六所，今列表於後：(註81)

遼州友愛醫院	Brethren Hospital	1914
平定友愛醫院	Brethren Hospital	1913
芝罘毓璜頂醫院	Temple Hill Hospital	1914
平度浸會醫院	Oxner-Alexander Memorial H.	1911
泰山長老會醫院	Sarah Walkup Hospital	1917
紹興基督教醫院	Christian Hospital	1911
南宿州醫院	Goodwill Hospital	1917
長沙湘雅醫院	Hunan Yale Hospital	1912
常德廣德醫院	General Hospital	1915
衡州仁濟醫院	Presbyterian Hospital	1912
敘州浸會男醫院		1917
敘州浸會女醫院		1917
長樂基督教醫院	Christian Hospital	1912
同安醫院	Elizabeth Hospital	1912
東山兩廣浸信會醫院	Leung Kwong Baptist Hospital	1917
南寧南寧醫院	General Hospital	1915

再依年鑑的紀錄，民國三年（1917），住院的病人已達十二萬七千人，門診者有二百十三萬人(註82)，以後陸續增長，雖在第一次大戰發生後，仍不受影響，到民國六年（1917），本期結束時，「中國基督教博醫會」與「中國醫學會」開聯合會於廣州，針對前數年的醫療工作作成總結，在檢討中，決定了反對嗎啡私運入華議案，也決定要建議政府設立公共衛生部，中央醫務部，並積極計劃全國醫學校的課程與程度，以期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至於議決後，馬上付諸實現者，有預防傳染，禁止嗎啡鴉片吸食，提倡清潔等等運動等公共衛生事業，充分顯示了在醫療工作上的積極性，而其成就也確實不凡。

註80：同註18，頁121—123，教會之行醫事業，全國大會議案。

註81：同註5。

註82：同註18，頁123—126，顏福慶著：醫學概論。

D. 慈惠與社會改良

慈惠工作與社會改良兩項，在基督教會而言，是一種責無旁貸的工作，教會不能獨善其身，要有社會關懷方面的具體表現與行動，而這些社會關懷也能成為教會傳教的一種媒體，能反饋於教會，是故教會更樂意去積極投入，擴大有關慈惠與社會改良的範圍；在時間上言，則進入本階段時期後，更顯得積極，成績也最為豐碩。

在慈惠工作上，針對社會中最需要憐憫的盲聾啞者，孤兒，痲瘋病患者，給與關懷救濟與教養；由於在中國社會中，殘障者素為社會所看輕，其一生的命運，注定要坎坷悲慘，但基督教會自東傳後，由教義上啟發出來的社會關懷精神，人溺已溺的憐憫胸懷，使教會很早就注意於此，並付出了實際的行動，所以瞽目院、孤兒院、痲瘋病院都相繼成立，使這些殘障者，在生活上不致匱乏，更在信仰上，給與求生奮鬥的信心，培育出積極樂觀的人生觀，可謂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都兼顧到。

在民初的時候，根據年鑑上所列的紀錄，已有十一所盲校，分別設在上海、寧波、福州、廣州、九江、漢口、長沙、益陽、奉天、北京、保定等地，其中福州有兩所，其中一所係盲女書院，校名「明道盲童女校」，以後逐年增加，造福盲生無數。（註83）

啞者亦需關懷，施以手語，以通彼此意念上的構通，第一所啟聰學校，設於煙臺，校名「煙臺啟瘖學館」，男女兼收，由教會支持，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學成之後，鼓勵諸生回歸家鄉開創，因而杭州、福州日後都順利成立，嘉惠聾者之處多矣。（註84）

孤兒院之設立，依民初的教會年鑑所紀錄，計有卅六所，教會所設立支持者，佔了絕對多數的比例，收養孤兒數目，則已達二千五百餘人，孤兒院設置的地區，分佈於十四個省分（註85），江蘇省境內最多，計有十一所，而成立孤兒院的時間，早於本世紀之初（1900）者，僅有六所，其飛躍的發展，紛紛設立是邁入本世紀後，然皆屬地區性的孤兒院，全國性的有關組織則尚未成立，無形間限制了發展，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痲瘋病院的設置，係為身患痲瘋惡疾所設，中國痲瘋病患在清末民初時，已不下數十萬，教會動起憐憫之心，在各地設立痲瘋院，以收容病患，施以仁慈待遇，衣食居住，則給與清靜安適，不至匱乏；設立之痲瘋院，依民初的教會年鑑中記載

註83：同註18，頁130-134，傅步南著：盲童學校。

註84：同註18，頁134。梅女士著：烟台啟瘖學館記略。

註85：同註18，頁135。包斐雨著：論孤兒院。

，有廣東之北海，浙江之杭州，福建之福州與福清，廣西之梧州，廣東的東莞，湖北的孝感，山東的煙臺，雲南的昆明，甘肅的蘭州等處，這些痲瘋病院都由英國「痲瘋救濟會」協助，對中國痲瘋病患的照料，十分細心，嘉惠於痲瘋患者多矣，唯一美中不足者，患者之衆與病院之設立收容，兩者之間仍十分懸殊。(註86)

至社會改良工作方面，則積極透過早先成立的萬國改良會中國分會(1908)(註87)積極從事，該會的宗旨在「以聯合衆力，改良不善之風俗，擯絕無益之嗜好，增進社會之幸福，扶助世界之進化，高尚人類之知識，拯救平民之困苦」，以勸同胞戒煙酒嫖賭，不早婚、不纏足、不納妾、不買奴婢、不爲不正營業爲努力之目標。

茲以目標衆多，在民初時期，改良會集中人力與物力於禁絕煙毒一事，故收效最宏，全國有十四個行省禁絕，只留有甘肅、陝西、江西、雲南、貴州、廣東、江蘇七省，尙未肅清，故改良會仍繼續努力於此七個省份。

民國三年(1914)，歐戰爆發，萬國改良會總部無暇兼顧在華工作，因此改組成「中國萬國改良總會」，獨立發展，繼續前此未盡之事功，各省分會也紛紛成立，依當時的總幹事丁義華在教會年鑑上的該會情況報告云：

「……鼓吹社會改良，擯除無益嗜好，以期轉惡俗而敦醇風，由開化而求進步。」(註88)

顯示自許極高，也充滿著樂觀前途。

4. 教會的隱憂問題

本階段時期(1911~1917)內，雖然因時局環境的配合，教勢大大地發展，但這段時期之內，也存在著一些隱憂問題，使得教會在日後的發展上，深受其影響，這些所謂的隱憂問題，以神學見解之分歧與傳教方法之差異最爲明顯，現分別敘述於下：

(1) 神學見解之分歧

基督教既來自歐美地區，係由歐美地區派出大批傳教士前來中國傳教，創立起教會，以致基督教義與神學思想，都深受歐美的影響，易言之，當歐美地區神學思想與見解有所改變時，中國教會必受波及，跟著產生改變，然保守者則固受壁壘，不肯隨從，於是神學見解之分歧現象產生。

當十九世紀的末葉，歐美的國情變化萬千，深深地刺激人類的思想，基督教的

註86：同註18，傅樂仁著：論痲瘋症。

註87：同註18，丁義華著：萬國改良會。

註88：同註18。

神學思想也受到時代的挑戰與衝擊，因而有所謂新神學思想的產生，這種新神學思想與舊神學思想之間差異之處甚多，前者思想與時代潮流隱合，強調在人間建立上帝之國，而後者思想則拒與時代潮流隱合，仍深信上帝之國是隱而未現，並不在地上；前者重視整個社會有機體的得救問題，而後者重視個人靈魂的得救問題，前者重視今生，堅信上帝居留於世，故要使世界更聖潔，更適合上帝居留。後者則輕視今生，低估今世的生活，從以上這些差異之處，可以看出兩者間的距離越來越大。（註89）

尤有進者，新神學思想還受進化論的影響，接受了對外國文化應尊敬與欣賞的態度，認為對所要宣教地區的文化應該要有深刻的了解，不能只憑過度的熱心去行事，一九〇〇年的庚子排外之亂，也給這些新神學思想家一個強烈的刺激，重新檢討以往宣教政策的可行性，是否可以仍藉著戰爭或商業去傳佈基督教，總之新神學思想在宣教上，已轉向重視社會的實際需要，他們改變過去只重視個人虔誠屬靈生活教導的方式，進而由過去的理想主義落實到社會的基本需要，這些新神學思想所影響於宣教士們的實際工作與觀念者，通稱之為社會福音派（The Socialization Wing）（註90）；而固守拒變者則稱之為保守派（Conservatives Wing）（註91），以上的神學思想之爭，由國外傳入，在中國也引起紛爭，從而影響到傳教方法之差異了。

（2）傳教方法之差異：

自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西方有新神學思想興起後，由於植基於「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因此影響到其傳教方法上，強調要幫助中國人去了解西方社會，也主張更多提供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服務，而不主張只單一地傳播救恩為務。總之，由新神學思想之興起，產生了以「救時」重於「救靈」的社會福音派，在傳教上的策略與方法，則重視透過贈醫施藥，開辦孤兒院、養老院以及救荒濟貧等等社會服務工作，引導中國同胞歸向基督教的信仰。（註92）

而固守傳統，拒絕接受新神學思想者，則堅信「個人得救」（individual salvation）的重要性，故「救靈」（saving souls）是第一要務，絕不捨本逐末，絕不將「辦教育」，「傳知識」的「人的作為」（work of man）置於前，「絕不

註89：同註17，頁146

註90：Paul A. Varg: A Survey of Changing Mission Goals and Methods, in Jessie G. Lutz (ed)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Evangelists of What?* (Boston: D. C. Heath & Co, 1966) PP.5—6

註91：同註90：

註92：梁元生著：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頁2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1978）

為傳播西方的人文主義及教育利益而感到滿足，以為對華人極盡物質的關懷，不如使一個人入教，令他明白基督教的信仰」(註93)。總之，傳教的方法，不應有所妥協，要保持信仰的純一，「救靈」是唯一工夫。

雖然神學見解之分歧與傳教方法之差異，問題存在已經許多年了，但在本階段內，由於社會福音派勢力的日漸膨脹，由原來的劣勢，逐漸與保守的救靈派形成相拮抗的地位，這些內部的紛爭，顯然已是一個隱憂，雖然在民國二年(1913)的全國大會上，保守的救靈派，仍堅持舊有的觀點，但社會福音派的見解已經被許多傳教士所接受，影響力已越來越大了。

5. 本期總結

綜論本階段的在華教會大勢，由於政局的改變，基督教取得了合法的法律地位，基督教徒由昔日「教民」的身份，變成合法的國民，享受信教的自由，得著尊重，不再受鄙視，加上素質較佳的傳教士適時擁到，宣教策略上又由單一的佈道轉變成多元的社會福音方式，因而形成一教勢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教會的全盛時期，但在全盛發展的背後，一些隱憂的問題，也逐漸顯明，基督教會又要接受來自內、外的挑戰了。

註93: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P.20.

臺大歷史學報